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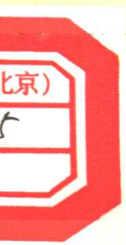
传统文化
现代视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关通天地人

——《周易》今读

朱亚燕 陶伯华 编著



传统文化·现代视野

主编：金开诚

关通天地人

《周易》今读

朱亚燕
陶伯华

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通天地人:《周易》今读/朱亚燕,陶伯华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传统文化·现代视野/金开诚主编)
ISBN 7-5306-3130-6

I.关… II.①朱…②陶… III.周易-研究
IV.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12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8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1—8000 册

定价:12.50 元

总 序

金开诚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在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上做一点儿尝试与探索。

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侧重在考证与评估上。考证是为了辨别各类文化成果的真伪,弄清各种文化现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则是为了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评定各类成果的优劣。这些工作当然很有必要,取得的成绩也相当巨大。

但是,只做考证与评估,还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充分的继承与弘扬。因为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传统文化更加贴近群众而利于久远的流传,也不能使各类文化成果所含的张力在现实的文化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有一个事例似能给人一定的启示。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长期以来得到许多考证,并久已被评为超一流的杰作。但它并未因此而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与欣赏。倒是《离骚》中的两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却由于鲁迅把它用之于现实的奋斗与追求,故而相当深入人心,使人受到感染与教益。

在我们看来,考证与评估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手段,“古为今用”才是目的。这就好比祖宗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固然首先要加以清理,但清理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不但要用好,还要尽可能把它“盘活”,使之在现实中生发和增殖。假如有了遗产不会

BAD17/10

使用,经过清理便束之高阁,那么它早晚将变成没有多大用处的历史陈迹。

清理评估与“古为今用”虽然着力点和所起的作用各有侧重,但并不是互不相干的。因为传统文化的使用离不开对所用的文化成果的认识与评估;而反过来说,使用就是实践,实践正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以使用的结果正可以促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评估。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古为今用”,还由于对国外的情况颇有感触。中国传统文化已多次在国外掀起这个“热”那个“热”,诸如“老子热”、“儒学热”、“周易热”、“三国演义热”、“孙子兵法热”乃至“莱根谭热”等等。在这些“热”中,固然也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但主要的却是“热”在“用”上:用于商战、用于地缘政治、用于军事、外交乃至处世行事等等。这就意味着当我们中国人面对祖宗留下的一大堆弓箭而只是热衷于评论其优劣利钝的时候,外国人却直接瞄着种种现实的目的在那里开弓放箭了。对照这种情况来看,我们中国人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未免过于“学究气”了;当然,“学究气”是应该有的,但同时能不能在“用”字上也下点功夫呢?我们认为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

“古为今用”常常会涉及“文本”与“诠释”的问题。因为把古代的思维经验灵活运用于今天,这既会碰到“文本”原义与现实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碰到在把“文本”做跨领域的使用时怎样加以引申的问题,因此不能不结合“古为今用”的具体对象做必要的“诠释”。关于“诠释”,现在有些人的做法是大有灵活度的,有时可能基本不顾“文本”原义而只按主体的理解立说,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诠释学”根据,这里不必多说。我们只想说明,本丛书中的“诠释”仍力求大致符合“文本”的原义。但“文

本”中的信息既然是出现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对其原义就不能不做一定的变通与发挥。

在编撰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意识到“古为今用”也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过程,我们自己实际上还学得不深,用得不活,因此有些讲解未免流于一般,有的甚至捉襟见肘,比较生硬。我们希望本丛书的问世能有助于读者立足现实学习传统文化,提高“古为今用”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至于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则希望广大读者给以指正。

导 言

被东方学者称为“天书”、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圣经”的《周易》，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智慧宝典，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源头，是规范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思维“基因”。它雄踞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首、三玄（易、老、庄）之冠、世界三大经典（易经、圣经、吠陀经）之巅。

《周易》的形成与《周易》的阐释，持续五千年，撰书三千种，可谓人类思想史上最宏大的一项智慧工程。

《周易》有它光荣的过去。它为中华古文明领先欧美、称雄世界，锻造了思维工具。

《周易》有它衰落的悲哀。它没有随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而及时做出结构的更新，突破神秘的、朴素的古老外壳。

《周易》更有它灿烂的未来。以开放的襟怀、现代视野、变革的精神更新后的《周易》研究，将为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益启示。

一、《周易》与易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智慧工程

《周易》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观察、思考、提炼、深化过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相传是上古时的伏羲制卦，中古时的文王系辞，下古时的孔子作十翼。

上古伏羲制卦。

《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的基础是八卦，八卦的发明权则归之伏羲氏。从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看，八卦的创作很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上古原始人的集体创制，其中伏羲氏起了关键的作用。从卦画看，最初出现的数字符用一、五、六、七、八、九六个数字组成。以后六个数字简化为奇、偶两数，即用“一”代表一、五、七、九四个奇数，用“八”代表六、八两个偶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阴符即为数字“八”。直至通行本《周易》，八卦才用阴“--”、阳“—”符表示。可见从数字符到阴阳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从繁琐到简易、从粗略到精巧的“易简”提炼过程。

中古文王系辞。

《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司马迁也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文王拘而演《周易》”。看来周文王的贡献有两个：一是演《周易》，即是将夏易《连山》、殷易《归藏》，演化成代表新朝代的《周易》。《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六十有四”。这就是说，三易都有八个基本的“经卦”和六十四个衍生的“别卦”，它们的区别在于卦序和卦爻辞的不同。夏易《连山》以《艮卦》居首，艮为山，艮与艮重，象征山与山连，故曰《连山》。《连山》看重山，当是夏民狩猎山林的反映。殷易《归藏》，以《坤卦》居首，坤卦象地，地为万物所归所藏，故曰《归藏》。《归藏》看重地，当是殷民进入农业社会后对土地的崇拜，也是殷道贵慈，重母系的反映。文王演《周易》，仅是在夏易

与殷易的基础上改《乾卦》为首。乾象天，象父，象刚，显示了新兴的周代由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华夏先民活动与认知范围由山林扩展到大地再扩展到天地的进步。

周文王的第二个贡献是撰著《易》之卦爻辞。但细考爻辞，有文王死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故又有文王之子周公撰爻辞之说。今人猜测，卦爻辞也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的卜史们积累的成功预测案例的汇集与再加工。但从卦爻辞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充盈的忧患意识、变革精神来看，其创作时间大致是在殷衰周兴的中古时期。

下古孔子作《十翼》。

最早记载孔子作《十翼》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易纬·乾凿度》也说：“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但阐释《易经》的十翼（即《易传》）到底是孔子所作，还是后儒托孔子之名所作？是先秦时期所作，还是西汉时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对《十翼》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十翼》的成书也广泛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的思想成果。《易传》明确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把阴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易道”变化的根本规律；并以此来贯通易数、易象、易辞、易占，促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飞跃；也标志着《周易》独特理论模式和完整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可以说，没有《易传》，就不能完成《周易》从占卜之书向哲学经典的转变，就不能使《周易》登上世界古文明众多经典之巅。

由于《周易》经传体大思深、蕴藏巨大的学术文化发展空间，这就为后世各派易学的注疏、发挥、深化创造了文本条件。汉易

重象数，经汉儒整理与发挥，阴阳——五行——八卦体系得以系统化、完整化。针对汉易末流繁琐化、戡纬化的倾向，魏晋王弼扫象，开创义理学派。宋易一面发展义理学，一面开创“图”、“书”学，揭示《河图》、《洛书》与八卦太极图的内在联系。清易重考据，在诸派易学的汇通与综合上做出了贡献。

清代出版的《四库全书》，在《易类小序》中对三千年的易学发展史作了一个简明的概括：“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贲），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如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一部《周易》，从经到传，短短六千余言；从原典到诸说，洋洋三千余册；几乎调动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才智。可以说，《周易》与易学是世界历史上最宏大的一项智慧工程，是华夏先民对人类思想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周易》为中华古文明称雄世界锻造思维工具

华夏先民为什么要以五千年不竭的热情投入《周易》的创制与易学的研究呢？人类思想史上这项最宏大的智慧工程的历史功绩又是什么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探讨中华古文明与它的思维创造工具的关系之谜。

中国是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并立的世界文明古国，又

是唯一的将远古文明持续地推进到中古文明、在15世纪前一直保持着世界科技与经济领先地位的东方大国。伟大的文明创造必然要以自觉的逻辑思维作工具。爱因斯坦在作东西方文明比较时,惊奇地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46页)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中华古文明之谜:中国的先哲没有走从演绎法到归纳法的西方形式逻辑发展之路,但中国古代伟大的科技发现与发明却全都做出来了,那么这些伟大的科技成果是借助什么逻辑方法来取得的呢?中国的先哲们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巨匠们提供的那些执世界科技牛耳的逻辑工具又是什么呢?

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就要追根溯源,对人类第一个文明轴心期先后形成的三大逻辑体系作横向比较。人们发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作为第一个独立的演绎逻辑体系,对三段论的推理形式、方法、规律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并且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印度的古因明五支式,探索了因果类比推理的形式结构。伴随佛学发展,因明逻辑从类比推理的五支式演变为归纳演绎推理的三支式,提高了推理的可靠性。与此相比,有些人认为作为中国古典逻辑顶峰的先秦逻辑,无论在逻辑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上,都还不及亚氏逻辑,更不及今天已经建立起来的普通逻辑的理论和体系。除了墨家《小取篇》和荀子的《正名篇》还比较像一个逻辑专文外,其它的逻辑理论都还是比较分散或零碎的。以后虽然唐朝输入了印度的因明逻辑,明代

又引进了西方逻辑《名理探》，但它们对于中国形式逻辑科学的推进影响甚微。于是一些人引出了虚无主义结论：“东亚向无论理学”，“名理之学，我国素不讲求”，“就我们所知，中国的哲学书籍似乎完全忽略了逻辑和认识论”。

如果把全部逻辑史只归结为形式逻辑的演绎与归纳兴替史，如果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上，完全套用西方逻辑体系来评价、阐释中国古代逻辑，那么我们看到的确实只能是“体系的零碎”、“理论的不成熟”、“推理方式的低级”，并且先秦之后的逻辑研究更是“时断时续，每况愈下”。然而，如果中国的古代贤哲真是这样平庸无能，那又如何来解释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如此久远灿烂，如何来解释先秦以来近二千年的文明创造高潮叠起呢？显然要科学回答爱因斯坦提出的中华古代科技创造与东方逻辑思维关系之谜，就必须首先对中国古典逻辑史的阐释视界作一个根本性的变换。在这个问题上倒是那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欧美贤哲反而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尽其大半生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后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7页）对发展辩证逻辑与有机宇宙观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的就是中国古代持久不懈的易学研究，特别是《周易》创造的一套象数符号系统直接为辩证类推提供了简易有效的思维工具。

清人陈梦雷在《周易浅述》中指出：“易之为书，义蕴虽多，大抵理、数、象、占四者尽之。”“六经皆言理，独易兼言数”，“理数之

备，于象可知。……知象则理数在其中”，“有象即有占”。可见，运数、立象、探理、测占，是《周易》进行辩证类推思维的主要方式。

首先是运数。

《易》产生于卜筮，卜筮就要运数，筮数的奇偶决定着卦爻的阴阳。这就是《说卦传》指出的“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从具体的数字符到只有“一”和“八”的奇偶符，再到“—”“--”阴阳符，正表现出了蓍草的奇偶数与八卦的阴阳爻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从奇偶数列的演中，也可导出四象($2^2 = 4$)、八经卦($2^3 = 8$)、六十四别卦($2^6 = 64$)。这就是“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其次是立象。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不过这种易象不是客观现象的复制，而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特征，表现出高度的简明性、抽象性。它仅用“—”“--”两个符号，通过不断递升的两两组合，演化出无穷无尽的世界物象。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极”、“仪”、“象”、“卦”都是不同阶段的物象名称，实际上是最本原的世界类象。这些类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原因就在它们抓住了天地人三才同构。在天地创化的本原现象与万物生成的派生现象、五行生克的基元关系与系统有机演化的对应关系间进行象征类推活动。这样，八卦所取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名虽小，却可以广泛而有效地对应于天文类、岁时类、地理类、人事类、身体类、动物类的各种相应性质的物象。

再次是探理。

《周易》的象数符号系统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也就是说“象”中寓“赜”，“象数相倚”表征着“天下深赜之至理”。这一“天下深赜之至理”，即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理变化规律，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贯穿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

“易”即是“反易”。易理推原于太极，托始于乾坤。乾坤是阴阳相反之物，八卦是四对相反之物，六十四卦是三十二对相反之物。《易传》中频繁出现的日月、昼夜、幽明、男女、奇偶、虚实、动静、圆方、死生、鬼神、贵贱，都是可用“—”“--”两符表征的相反之物，即矛盾着的对立面。

“易”即是“交易”。阴阳两种矛盾体，既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它们可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易传》在阐释“交易之理”时，提出的“刚柔相摩”，即是对立面的相互接近；“情伪相感”，即是对立面的相互感应；“阴阳相薄”，即是对立面的相互斗争；“八卦相销”，即是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易”即是“变易”。对立面通过相摩、相感、相薄、相销，于是“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产生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突出表现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变革思想。六十四卦的排序就反映了事物发展“非覆即变”，不断转化的趋势。六十四卦每卦六爻，按照初、二、三、四、五、上的顺序由下向上排列，象征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爻位的基本特征是，初爻像事物发展的原始萌芽阶段，二爻为适当进取阶段，三爻为小成阶段，四爻为即将成功阶段，五爻为成功阶段，上爻为路尽向反面发展阶段。各卦爻位的变化也非常复杂，一般来说每一阶段均有向两个方向发展

的可能性。

复次是测占。

《易经》象数符号系统通过阴阳八卦与奇偶数列、《河图》《洛书》与五行九宫、卦爻方位与太极函数的对应关系，深刻揭示了在“道”这一宇宙根本规律支配下万事万物最基本的运作状态与发展趋势。由于阴阳矛盾规律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宇宙根本规律，因而反映这一规律的《易经》象数符号系统对各个未知领域、各种变化趋势有普遍的预测类推意义。正如荀子所总结的“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解蔽》《非相》）。《易经》正是靠制割宇宙根本规律的“大理”，通过象数符号系统“以类度类”，而“材官万物”、“梳理宇宙”，使辩证思维与有机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天文、医学、数学、农学、冶金、建筑以及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黄帝内经》正是以阴阳变化为病理根本，以五行生克来类比人体五脏、五体、五窍、五色、五味、五志、五气的有机联系，由此确立了辩证诊治的中医独特体系。

不可否认，《周易》作为上古时代的一部卜筮记录之书，其主要测占功能是用来“以卜筮决于天命”。上古巫风弥漫，初民迷信鬼神，以为卜筮可以沟通天人、传达天意、祈福消灾、决策定命。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有识之士开始对神秘的易占提出质疑。如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周易》中有一篇《要》，为《易经》原佚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段重要的对话：“夫子亦信其筮乎？”“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荀子更是在他的《大略》篇中公开申明：“善为《易》者不占。”《史记·日者列传》也记载了贾谊尖锐的批评：“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

虚高人禄命以说(悦)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晋书》描绘郭璞的易占功夫达到神异灵验的极高境界,但郭璞用易卦占筮进谏大将军王敦而引来杀身之祸,却无异是对神秘主义算命术的极大讽刺。对于《周易》的历史局限与神秘主义糟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那样,摒弃其神秘主义的外壳而拯救其合理的内核。

概而言之,《周易》象数符号运演系统把数、象、理、占(类推)和谐统一起来,表现出了华夏先民的高度智慧。它使辩证法成为可操作的思维法则,它使中国的逻辑思维水平从质上高于西方与印度的形式逻辑,它使中国的古文明创造获得了更富活力与生命力的思维工具。但《周易》制割之理,乃是“天下深赜之至理”,是“宇宙大理”,它虽能“类万物之情”,却不能代替具体“物理”、“事理”的实证研究。至宋明理学,“理”范畴的类别性与层次性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人们意识到,尽管事事物物之中,共有一个“太极之理”(“道”),但事事物物又各有其“殊理”。一物不穷,便缺了一物的道理;一事不穷,便缺了一事的道理。长于对普遍的辩证法则的预测类推,短于对实证的特殊规律的“求故”、“明理”,不能不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未能转化为近代工业文明的认识论原因之一。

三、《周易》为创造现代新文明提供思想启示

《周易》为中华古文明称雄世界锻造思维工具的历史功绩,毕竟已属于光荣的过去。萌生于结绳记事年代的这部古老经典,距离今天的信息电脑时代实在是太远了。时代的差距无情地将许多古代典籍尘封进历史的陈列馆。但奇怪的是,已经持续了三千年的易学研究热仍然不降其温。现在,易学不仅在中

国热,而且在世界各地热。《周易》的各种外文译本层出不穷,各国易学研究会纷纷成立。“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二千多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它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可以相比。”(美国哲学家 F. 卡普拉语)“谈到世界人类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中我们所得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欧洲哲学家 C.G. 捷思语)当代易学研究“能够发挥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美国国际易经学会成中英主席语)

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互补合流、综合创新,已蔚成大势。现在,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以 21 世纪的现代目光来审视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我们将不再厚古薄今,盲目拜倒在《周易》的神秘性下;也不再以今非古,媚外抑中,以西方片面的理性主义裁量一切。我们将以开放的襟怀、现代的视野、变革的精神,吸取古今中外文明创造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以这种襟怀、目光、精神来对待《周易》,我们就一定能从这部智慧宝书中吸取更多的营养,以重新塑造现代新文明的思维方式、人天关系与价值体系;我们就一定能从这部古代百科全书中,获得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人文等各个方面的有益启示,以利于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

第一,构建现代新文明的人天关系。

“究天人之际”,是人类的不竭追求,也是哲学的永恒主题。“究天人之际”,目的是要处理好“人天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人能在自然与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发展。

在处理天人关系上,存在着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在“回归自